

生命政治理论视阈下数字时代的非物质劳动

——基于哈特奈格里生命政治理论

韦畅

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DOI:10.61369/SE.2025040018

摘 要 : 奈格里和哈特的生命政治理论强调了非物质劳动在数字时代的重要性。非物质劳动, 涉及知识、信息、文化内容的创造与传播, 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关键形式。在数字时代, 这种劳动超越了传统工业劳动的界限, 与个体的生活经验、情感和社会关系紧密相连, 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生产和价值创造领域。数字时代的非物质劳动也带来了挑战和机遇, 如一方面加深了资本逻辑下的劳动者异化, 但是另一方面增加共同体和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性。

关 键 词 : 生命政治; 数字时代; 奈格里; 哈特; 非物质劳动

Immaterial Labor in the Digital 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opolitics Theory: Based on Hartnegri's Biopolitics Theory

Wei Chang

School of Marxism,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 Negri and Hart's biopolitics theory emphas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immaterial labor in the digital age. Intangible labor, which involves the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content, has become a key form of accumulation in capitalism. In the digital age, this kind of labor transcends the boundaries of traditional industrial labor and is closely linked to an individual's life experiences, emotions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forming a brand-new field of production and value creation. Immaterial labor in the digital age also bring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nstance, on the one hand, it deepens the alienation of workers under the logic of capital,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increase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realization of communities and communism.

Keywords : biopolitics; digital age; Negri; Hart; non-material labor

奈格里和哈特在著作《帝国》中提出“生命政治劳动”理论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深刻批判与重新解读。他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传统的物质生产逐渐让位于非物质劳动, 即生命政治劳动。这种劳动形式不仅生产商品, 还生产出主体性和社会关系, 从而模糊了生产与生活的界限。奈格里和哈特强调, 生命政治生产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生产形式, 它超越了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区分, 将所有社会生活纳入其范畴。这种生产方式强调自主性、协作性和网络组织, 使得劳动者不再仅仅是被剥削的对象, 而是通过自主协作和自发网络组织进行生产的主体。

一、奈格里和哈特的生命政治理论基础

(一) 生命政治理论的继承

1976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讲座中提到“生命政治”的新概念, 在他看来动物性生命成为政治对象后, 政治权力通过规训机制直接影响个体的身体和日常行为, 表现为“权力力学”, 且权力技术可以通过对人口的调节来对社会进行管理。同时福柯认为在权力控制下身体和权力之间是生产和被生产的关系。

哈特和奈格里的生命政治权力概念来源于福柯, 差别在于他

们认生命政治权力不局限于对人口等要素的调节和对个体生命的影响, 而在于权力也激发人们的生产性。他们强调面对权力的强力控制, 人性中存在永不满足的欲望和冲破原始社会秩序的欲望。意味着面对权力控制人并不是消极被动而无所作为的, 人是永远存在抵抗的, 在抵抗中人们也在进行社会生产, 也就是生命政治生产。在这一层面不是权力而是生命对权力的反抗具有生产性。

他们结合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认为生命政治生产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生产形式, 这种生

产形式模糊了传统生产和再生产的界限，并且主要表现为非物质特征。在这里奈格里也借鉴了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非物质劳动理论，发展了关于非物质劳动的概念。他们将非物质劳动视为生命政治生产的核心，认为这种生产不仅涉及商品的物质内容，还涉及信息、文化内容等非物质产品的创造。正如他们在《帝国》中将非物质劳动界定为“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哈特和奈格里强调，非物质劳动不仅是资本主义增殖的生产方式，同时也是生产者主体性的生产，具有打破资本主义控制的革命潜力^[1]。

（二）非物质劳动

哈特和奈格里通过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框架，将非物质劳动称为生命政治劳动，强调其在生产过程中对主体性的影响。生命政治劳动的核心在于生产知识、信息、情感等非物质产品，这些产品不仅是智识性的，也是肉身性的。生命政治劳动将劳动从物质生产转向非物质生产的过程，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知识与信息的生产，生命政治劳动强调知识和信息的生产，这些产品无法通过机器完成，需要依靠主体间的合作来实现。这种生产形式摆脱了资源稀缺性的逻辑，强调自主性和协作性。二是情感与交流的力量，情感劳动作为生命政治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情感成为资本逐利的新要素。这种劳动形式使得生产与生活的界限逐渐模糊，情感和交流成为重要的生产力。三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生命政治劳动不仅生产商品，还生产社会关系和主体性。这种生产方式强调社会合作和共同性的构建，从而生产出新的社会形式。四是劳动与生命的融合，在生命政治生产中，劳动者不仅是生产者也是被生产的对象。劳动与生命、生产与再生产的边界变得模糊，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界限被打破^[2]。

生命政治劳动通过非物质劳动的形式，将劳动从传统的物质生产转向包括知识、信息、情感等方面的非物质生产。这种转变不仅改变了生产的内容和形式，也重新定义了劳动者与社会的关系，也给资本在社会生活中有更加全面剥削控制人提供机会^[3]。

二、数字时代非物质劳动的特征

（一）劳动形态的数字化与虚拟化

劳动形态的数字化与虚拟化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这一变化不仅深刻影响了劳动的内涵和外延，还重塑了劳动关系和社会结构。数字化劳动是指劳动者利用数字技术、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工具进行的劳动活动。这种劳动形式具有智能化和虚拟化的特征，其产品多为依托于数据的虚拟化符号，如信息、知识等非物质形态的商品。虚拟劳动则是指在虚拟空间中进行的劳动活动，其劳动资料包括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的电脑、网络以及各种电子媒介。这些工具能够突破现实条件限制，构筑虚拟化的数字空间，使得劳动者可以在虚拟环境中模拟现实或不可能发生的事物。因此数字化与虚拟化改变了劳动形态的基本特征。首先，劳动空间变得网络化，劳动者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物理工作场所，而是可以在家中、公共场所或任何有网络连接的地方进行工作。其次，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的界限变得

模糊，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难以区分，这使得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变得更加困难。此外，劳动关系也变得更加灵活和不稳定，按需劳动和自由职业成为新的趋势，劳动者需要不断适应新的劳动需求和提高自身专业素养以获得更丰厚的收入。

（二）劳动过程的时空重构

数字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推动了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平台作为数字技术发展应用过程中的外化表现，在经济活动中承担着劳动资料的重要角色，此外化有两层意义：一是数字平台本身就是劳动工具，是以数字技术、数据和算法为核心要素所形成的技术型劳动工具；二是数字平台可以与传统劳动资料融合，使其维护更加精准、操作更为便利，实现传统劳动资料的数字化改造。劳动资料的数字化转型也带来劳动对象质的改变，传统物质生产要素通过物联网、互联网映射为无实物形态的数据。无实物形态的数据塑造了数字经济的虚拟空间。虚拟空间是对现实世界的映射，它是物质的但是无形的。准确地说，虚拟空间是由数据及符号所组成，或者说表现为计算机程序的集合^[4]。

虚拟空间同样是由技术空间和社会空间组成，但所不同的是，技术空间和社会空间可以在表象上发生分离，即劳动者与劳动者、企业家与劳动者无须局限于一定的物理空间之中。之所以强调“表象”，是因为虚拟空间也涵盖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尽管外在所看到的是分离的状态，但其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分离。虚拟空间使数字经济劳动过程的展开无须集中于固定的物理空间。劳动者对实物形态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操作转变为对存储于虚拟空间且无实物形态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操作。只要有可以操作数字平台的设备，随时都可以展开劳动过程。换句话说，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过程的展开呈现“原子化”状态。

（三）劳动成果的即时性与共享性

在数字时代，劳动成果的即时性与共享性是劳动形态和劳动关系变革的重要特征。即时性主要体现在非物质劳动的成果通常不需要物理产品的生产过程，而是通过信息、知识、情感等无形产品来实现。这些成果可以迅速生成并传播，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例如，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在线协作平台上的文档编辑等，都可以实时共享和更新。这种即时性使得非物质劳动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和变化，提高了生产效率。共享性则体现在其易于复制和传播的特性上。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数据和信息的复制成本极低，甚至可以实现无损复制，这为劳动成果的广泛共享提供了可能。例如，互联网平台上的知识分享、在线教育资源等都可以被多人同时访问和使用，而不会影响其质量或数量。此外，共享经济模式也促进了资源的高效利用，通过平台将闲置资源和劳动力进行整合和共享，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并提高了社会福利。

首先，数字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和成果的即时性。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劳动过程、雇佣关系和劳资矛盾等方面均出现了新的情况，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更加隐蔽、多元和深化。例如，算法控制下的数字平台空间中的劳动过程实现了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和环节转换效率的提高。这种即时性的提升，使得劳动成果能够迅速被市场接受和利用，同时也要求劳动者具备更高

的技能和适应能力。其次，数字时代的劳动成果具有高度的共享性。这种共享性不仅体现在劳动成果的广泛传播和利用上，也体现在劳动者之间的协作和知识共享上。也正是非物质劳动成果的共享性使得数字时代的劳动者合作和互动更加频繁和紧密。从而促使了新的社会关系，形成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共同性，人造共同性形式构成了诸众。这些共同性形式构成的共同领域是生命政治主体得以生成并寄居的场所。

三、数字时代非物质劳动的挑战与机遇

（一）资本逻辑下的劳动者异化

在资本逻辑下，数字劳工在高压环境中屈服于资本逻辑，如平台经济不断侵蚀醒着的时间，使数字劳工变成无休止工作的经济人，这种现象是资本逻辑对劳动者进行剥削和控制的直接体现。数字资本通过算法控制社会生产过程，扩张资本权力，恶化劳动环境，剥夺劳动权利，从而引发正义反思。数字资本利用技术性垄断加剧了劳资之间的不平等，深化了对数字劳动者的剥削和控制，使劳动者无法保障其正常权益，反而不断被压榨剩余价值。

大数据和算法的应用使得生命变得透明，同时侵犯隐私，进一步加剧了数字劳工的异化现象。数字劳动异化了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本身以及人的本质的关系，剥夺了他们的创造力和控制权。数字技术的劳动革命将资本的增殖从生产带入生活，超越了工作时间的固定界限，使得资本可以通过操纵生活时间来支配劳动者，从而产生生命权力。

此外，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劳动时间生产方式模糊了工作日与非工作日的界限，延长了工作时间，导致雇佣数字劳工需加班至深夜，并利用休息时间进修技能；非雇佣数字劳工的休息时间则转化为劳动时间。这种剥削模式不仅限制了劳动者的自由度，还

通过数据后台不断完善虚拟现实，悄无声息地支配个体生活。生命政治的存在是为了资本逻辑的发展，一旦保有生命的成本妨碍到资本的价值增殖，人的健康权、生命权等人权也就为生命政治所捐弃。因此，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赛博无产阶级更容易成为资本统治下的被驯服的“有用的力量”，数字权力的管控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二）共同性的构建与共产主义的可能性

非物质劳动在共产主义的构建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主要体现在其对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上。首先，非物质劳动在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中逐渐成为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改变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关系，还推动了生产方式的本质重构。这种劳动形式涉及知识、信息、情感交流等非物质产品，这些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共享性，这使得它们成为共产主义社会中重要的财产形式。

非物质劳动的核心作用在于其创造了一种新的公共性，即“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不仅包括自然中的共享财富，比如空气和水，更主要的是社会中的共享财富，如知识、语言、信息等。这种共同性的生产过程使得劳动者能够通过合作丰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增强社会的团结和协作能力。奈格里和哈特认为，非物质劳动为共产主义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因为它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实现了生产率、财富和社会剩余价值的创造，这种基于互动合作形式的生产模式为一种自发和基本的共产主义奠定了基础^[1]。此外，非物质劳动还促进了劳动的社会化程度，减少了不同劳动者阶层之间的质的差别，为大众的政治规划创造了条件。基于此可认为非物质劳动通过其创造性的、交流性的、认知性的特点，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劳动价值论，还为共产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通过共享和协作来实现社会财富的共同所有和控制，从而超越资本主义的限制。

参考文献

- [1] 吴韬. 从非物质劳动到数字劳动：当代劳动的转型及其实质 [J].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2019, (07): 4-13+83.
- [2] 陈飞. 非物质劳动的生命政治解读——基于马克思立场对哈特和奈格里观点的批判性反思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50(05): 128-139.
- [3] 周洪军. 生命政治：以个体生命为对象的政治形态——哈特和奈格里对福柯生命政治理论的借鉴与超越 [J]. 哲学研究, 2014, (10): 100-104.
- [4] 王宝珠, 王朝科, 王利云. 数字平台空间下的劳动过程分析——一个比较的视角 [J]. 教学与研究, 2022, (07): 45-56.
- [5] 徐宇晓. 哈特、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生产理论研究——从“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到“生命政治生产”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02): 122-129.